

海飞：我们为什么写下了那些曾经的小说

海飞，小说家，编剧。著有小说集《青烟》《像老子一样生活》、长篇小说《向延安》等，电视剧作品《谍战深海之惊蛰》《麻雀》《旗袍》等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游走在小说和影视文学的创作中，创作量非常大。我相信这不是一件好事，但对于“故事”的迷恋，让我沉醉在不停的创造中。我相信写作是一门手艺，市场一定不是检验小说质量的唯一标准，而顶尖的小说一定有读者市场。我相信很多作家都会做一些选题上的考虑，那么每位作家又是如何取舍的？冥冥之中，为什么我们写下了那些曾经的小说，而没有去写另一部分的小说？

我的创作一直在懵懂和凭借直觉的判断中前行，比如“谍战之城”小说系列，是因为和我客串的编剧身份有直接的关系，那导致了我对故事的选择，有了不同于纯文学的思考。小说《向延安》的创作，几乎是与电视剧《旗袍》并行的，质却保持着小说的纯粹性。为什么要考虑写这样一个小说，仅仅是因为想要表达年轻人在历史缝隙中的挣扎与选择，表现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年轻人的生存状态，以及他们的理想、爱情和信仰，还是另外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，我自己都不是想得很清楚。但是我想，人性的纠结与挣扎，人性的正反两极和复杂性，人性的秘

密，同样在这个小说中并存着。这使得这个小说，保持着文学最基本的底色，同时也呈现了那个年代上海城的众生相。

我选择让主人公金喜“普通”，使得《向延安》区别于同类型题材中常见的宏大叙事。“金喜话少、沉闷，用上海话说叫‘不响’。”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即使一直背负着骂名，他也从不向别人解释什么，只是默默承受。但“不说破不代表不明白”，在“不响”的金喜身上，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的影子。《向延安》描绘的城市中不同的青年群像，引起了一部分年轻读者的共鸣，所以在我看来，无论哪个时代，青春都有着相同的底色。他们尝试新的生活方式，对人生有不同的认知，这都是人在年轻时会做的事。叛逆，激情，充满幻想……每一代都是一样的。

这十年来，我写了许多谍战类型的小说，这需要我对谍战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《苏州河》是另一个写上海谍战与反特的小说，时间的跨度是在1949年的前后，写的是一个有

着警察理想的刑警，陷入到谍战中去的。我走访过上海警察博物馆，也收集了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市警察局的资料，和《向延安》一样，这个题材的小说，仍然是写大变局中人性浮沉。我另外的一个长篇小说《大世界》则把主人公设定成一个在“大世界游乐场”变戏法的年轻人，他是宁波人，在上海打工已经三年，家中有等待他回家的老婆孩子，多么像当下的人生。但是这个小说的特点是，故事从抗战胜利已显端倪的1944年开始讲起，全部发生在了主人公老家宁波。他因为要执行任务而“变心”，他“母老虎式”但是却十分大义的妻子，开始了对“负心人”的侦查和较量，最后她终于在查清真相后，和魔术师站在了一起，为掩护魔术师而赴死。当然，这只是小说的其中一条线，也是比较简单的陈述，更多的是从来没有谍战小说写到的“宁波生态”。

谍战小说写了十来年，这中间有一个小的旁支的创作，也是谍战，但却是写到了明

朝，也许会写到南宋。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探究，在写作的过程中需要查阅大量资料，反而让“写作成为系统阅读”的一种方式。《风尘里》《江南役》《昆仑海》成为第一组“古谍”小说，分别写的是北京、杭州、台州和琉球四座城市。这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，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方向，与一座座的城市相关，所以取名为“繁城”系列。在《昆仑海》中，我在后记中有以下文字：一年之后一切都变成了虚空，昆仑粉碎了这场阴谋，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人始终是渺小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获得的所谓的快乐，和蚂蚁获得的面包屑的快乐是一样的。

与之相呼应的是，罪案推理小说因为和谍战小说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，比如都讲究悬念和推理，于是也成为我想要创作的一种类型，比如设置一座海州城，完全可以以舟山为蓝本，打造一个明朝的码头城市，车马喧嚣，人声鼎沸，而走私，贩毒，杀人，越货，以及许多的诡异事件，也会在岛城一次发生。既然狄仁杰和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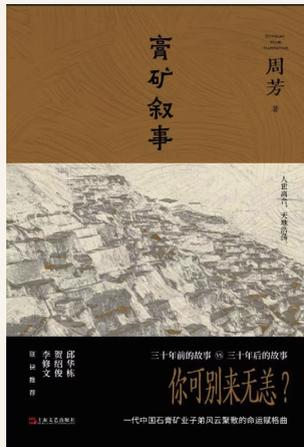
慈、包拯都成为断案的高手，那么在“海州城探案”系列小说中，也可以是有有一个著名的侦探，来侦查各种遥远年代的疑案。而在案件中管中窥豹，更是小说的终极需要抵达的地方。

这些年来，我以平均每年一部小说的速度向前推进，这些小说的字数篇幅都比较短，其实是大中篇。我也会偶尔写一下短篇，比如《走马灯》《我们就此别过》等。如果要讨论如何选择题材的方向，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考量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小说就是一条河流，作家不知道接下来的创作会顺着哪个方向流，如同我们永远不知道未知的命运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要有认知是，在集体浮躁的年代，如同经典的古典小说一样，好好地学会讲故事才是王道，如同我把所有的作品，都命名为“故事海”那样，提出的概念是，在文学的气象中，在故事的海洋里。

本周荐书

周芳

《膏矿叙事》



《膏矿叙事》

作者：周芳

出版社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膏矿叙事》是周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新世纪，贺小果、邱红兵、刘青松等一系列人物在国企石膏矿区的生活经历。小说背景设定在国企改革和打工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，矿区生活经历了种种起伏与冲突。主要人物面对出走与留守、爱情与欲望、信仰与金钱等选择，展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织。《膏矿叙事》采用了“双重”叙事视角，既有“经验自我”，也有“叙事自我”，互为补充，呈现多声部的时代样貌和人物命运。小说中的人物各有鲜明的个性色彩，既有清晰的时代烙印，也有对理想、爱情、信仰的追寻和执守，人性的幽微之光始终闪亮。

阅读者说

唐宋诗词中的春耕景象

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唐宋时期，诗人们用如椽巨笔描绘了当时多姿多彩的春耕文化。

人勤春来早，春耕备耕忙。唐太宗专门设立了“知春官”，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提醒农民搞好春耕生产。唐诗人杜甫在《洗兵马》一诗中就写道：“田家望望惜雨干，布谷处处催春种。”由于各地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，春耕生产的方式和时间也有所不同。有诗曰：“清明谷雨紧相连，浸种春耕莫迟延。”

曾任永嘉县令的唐诗人崔道融，对于农业更是上心。一次他在下乡途中，偶然遇到一个老农抓住雨后墒情好的机会，昼夜不停加快春耕，就写下了《田上》一诗：“雨足高

田白，披蓑半夜耕。人牛力俱尽，东方殊未明。”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写了一次雨后的春耕：“阳气先从土脉知，老农夜起饲牛饥。雨深一尺春耕利，日出三竿晓饷迟。”这首《春日耕者》诗，写农民忙于春耕，甚至连早饭都顾不上吃。

耒耜是先秦时期主要的翻地农具，到唐代仍被使用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《首春逢耕者》一诗写道：“南楚春候早，余寒已滋荣……眷然抚耒耜，回首烟云横。”而李白在《赠从弟冽》则写出春耕时也使用了耒耜：“日出布谷鸣，田家拥耒耜。”

唐代普遍应用筒车灌溉农田，为春耕春播生产带来了极大便利，诗人杜甫《春水》诗

中写道：“接缕垂芳饵，连筒灌小园。已添无数鸟，争浴故相喧。”宋诗人梅尧臣专门写了《水轮咏》，对筒车大加赞赏：“孤轮运寒水，无乃农者营。随流转自速，居高还复倾。”

宋神宗时期，汀州通判、诗人郭祥正的《田家四时》诗描述了雨后春耕以及种植管理各种农作物的繁忙场面：“田田时雨足，鞭牛务深耕。选种随土宜，播掷糯与粳。条桑去蠹枝，柔柔待春荣。春事不可缓，春鸟亦已鸣。”

北宋初年诗人林逋十分关注南方湖水改造农田的生产技术，他写过一首《葑田》诗：“淤泥肥黑稻秧青，阔盖深流旋旋生。拟倩湖君书版籍，水仙今佃老农耕。”这里说的

是，南方利用自然条件发明架田的耕作方式。架田，又名葑田，是一种浮在水面上的田丘。宋代的梯田发展也很快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过一个叫石磨岭的地方，这里的梯田层峦叠嶂，于是他写下了《过石磨岭》：“翠带千纒束翠峦，青梯万级搭青天。长淮见说田生棘，此地都将岭作田。”人们在山区开发梯田，增加土地面积，而在湖区和水滨地区，则是筑圩围田新增耕地面积。宋胡仲参《圩田》诗就写道：“圩田依涧水，入夏未栽禾。不是春耕晚，山中寒气多。”圩田这种技术逐渐在宋代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推广开来，这些地区大规模筑圩围田，星罗棋布，有效地增加耕地面积，增加了粮食产量。（刘永加）